

# 论冯友兰的教育和学术思想特色

张 林

(六盘水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贵州 六盘水市 553000)

**摘 要:**冯友兰的教育和学术思想独具特色。在教育思想上,他继承了蔡元培开创的“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并将这一教育理念运用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学术思想上,他明确反对中国封建传统“为官而学术”的错误倾向,强调学术活动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认为学术的价值主要在于学术自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提倡、促进教育和学术与为人民服务相统一。因此,冯友兰的教育和学术思想,对当代中国教育和学术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教育;学术;为人民服务;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924(2006)01-157-161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理念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强调读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做官。在生产水平低下、受教育者甚少的条件下,这种观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这种教育思想过分强调教育的社会性功利,严重忽略了教育和学术的自身价值。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老师,他曾感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而,恰恰因为孔子不在真正的权位上,故能著《春秋》,抨击乱臣贼子,发挥学术的社会批评和调节作用。二程、朱熹、王阳明等虽也是所处时代的政治领袖和社会活动家,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还是著书立学。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和学术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这就是庄子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庄子·天下篇》),被儒家的思想代表们推崇到极致,《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以及董仲舒、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无不把“内圣”看成“外王”的前提,这是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发展和嬗变。这种教育和学术思想直至科举制被废除后,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担

任校长以前,北大是被时人看成是“官僚养成所”,不少学生也把进北大看成是通向仕途的捷径。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和学术没有独立地位可言,其真正的价值也无从体现。

1928年,冯友兰到清华大学任教,担任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当时,清华大学正处于由留美预备学校向现代大学的转变过程,冯友兰亲眼目睹了封建教育和殖民主义教育给中国大学教育带来的危害,并为此而发表了一系列主张大学教育和学术独立的文章,提出了关于实现中国大学教育和学术独立的主张。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冯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继续发扬教育和学术独立精神,使其教育和学术思想独具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对“为官而学术”,追求教育和学术独立,认为教育和学术之价值主要在其自身;二是主张中国实现“知识自主,学术独立”,反对殖民主义教育;三是强调教育、学术为人民服务。具体论析如下:

## 一、发扬新文化运动的教育和学术独立精神

### 1. 创办《心声》杂志,响应“新文化”运动之教

**作者简介:**张林,女,六盘水市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

## 育、学术独立精神

冯先生的教育和学术独立思想,孕育于北京大学求学和燕京大学执教期间。这一时期,冯先生主要受蔡元培、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导人教育独立思想的影响。蔡元培在教育方针上主张“兼容并包”,故而能够包容新文化运动之左、中、右三派的不同主张,允许各种观点自山争鸣,使北大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基地。在学术上,蔡先生提倡“为学术而学术”,使当时的北大从官僚养成所变为理论研究中心。蔡元培到北大后,即提出所谓“三不主义”,即不做官、不当议员、不纳妾。冯友兰指出,蔡元培“意思是要学生远离政治,专心学术。他希望北大学生了解上大学不是为混一个资格,以为将来做官之用,而是准备以研究学术为终身事业,终身为学术服务”。<sup>[1]</sup>蔡元培还提出所谓“三事”,冯先生说,“其中二事最重要”,<sup>[2]</sup>一是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是官僚养成所;二是提倡“兼容并包”的思想。蔡元培的“三不主义”和“三事”,其中心思想就是“学术独立”和“兼容并包”。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梁漱溟等知名学者,就是因蔡元培“兼容并包”教育独立精神之鼓舞而到北大从事教育工作。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及实践,使包括冯友兰在内的北大师生逐渐认识到,大学是研究和传授学术的地方,大学中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学术上的成就,谁在学术上有贡献,谁就受到尊敬。“为官而学术”的思想逐渐被抛弃了。当时的学术思想凝结为“为学术而学术”。冯先生说,“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受到批判。其实这一口号所反对的是为做官而学术,这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sup>[1]</sup>

冯友兰于 191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冯先生并未置身新文化运动之外,而是发扬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五四”新学风之教育和学术独立精神。从北京回到河南后,冯先生便和友人办起了《心声》杂志,宣传进步思想。在《心声》发刊词中,冯先生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之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sup>[3]</sup>在《心声》八、九、十号合刊之“随感栏”上,冯先生发表随感二则,一论“教育界的‘瞎马’”;一论“教育界的‘功狗’”。文章指出,中国之

所以衰弱,就在于学术思想不及人家;批评当时的河南当局不重视教育。《必声》杂志所表达的这些思想,正是冯先生学术独立思想之雏形。

## 2. 主张中国培养自己的教师队伍

冯友兰于 1925 年离开河南中州大学,先往广州,后又北上燕京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冯先生即在《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三期上发表了《怎样办现在中国的大学》一文,提出了现在中国办大学的五条办法,其中之第二条即提出,“中国现在须力求学术上的独立”。<sup>[1]</sup>而学术独立的第一步是中国要培养自己的教员。他说:“请外国教员容易;请好外国教员难。况且我们还要求学术上的独立。请外国教员来教,与派留学生到外国去受教,事同一律,皆不能当作家常便饭吃。”<sup>[1]</sup>冯先生主张中国自己办教育,社会要为教师提供好的条件,“如此则此大学亦可常有像样的教员,而因之亦可有像样的本科矣。再假以时日,中国亦可有像样的学者,而中国学术亦可独立矣”。<sup>[1]</sup>这表明冯友兰倡导教育和学术独立精神,主要在于反对殖民主义教育的危害。

## 二、在教育实践中贯彻教育和学术独立思想

### 1. 发表《大学与学术独立》一文,论述大学教育和学术的地位与作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冯友兰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其教育和学术独立思想日臻成熟,并开始付诸实践。如他果断地将当时在政治上富有争议的张申府及在学术上显露创见的张岱年兄弟聘至清华任教,为促成清华大学哲学系多学科并存、不同思想学派互补共进的局面,做出了贡献。如刘鄂培所说:“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中国,国难临头。日本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客相勾结,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在思想领域,高压政策笼罩着中国。在此形势下,冯友兰先生勇于将张申府、张岱年先生聘至清华哲学系任教,足见冯先生有胆、有识。体现出他的治学和教育思想。也体现出清华哲学系传统的学风”。<sup>[4]</sup>“其实,冯先生的这些思想与蔡元培先生于 1917 年出任北大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完全一致”。<sup>[4]</sup>

1945 年,冯友兰发表《大学与学术独立》一文,指出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走教育和学术独立的道路,他说:“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要做

许多事情,其中最基本的一件事,是我们必须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的独立,学术上的自主”。<sup>[5]</sup>为此,他提出了社会和政府对于大学所应持的态度:一是对于大学尽量予以财政上的支持;二是对于大学不可有急功近利的要求;三是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

冯先生认为,实现学术独立的第二步是翻译外国著作,让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他说:“我们要想叫现代学术在中国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冯先生主张教师应该从教学、科研和翻译三个方面来为社会和国家作贡献,而重点应放在翻译上。他认为翻译见效最快,最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他说:“我想学校应该定一种办法,使教授能从教学、研究、及翻译三方面,出其所长,以贡献于国家社会。”使“百十人任其难,亿兆人获其益”。<sup>[1]</sup>也就是说,冯友兰在提倡教育和学术独立而反对殖民主义教育影响的同时,又主张中国人应学习外国的先进理论和文化。

在教育实践中,冯先生反对学术依附政治、依附权威。他认为社会不应干涉哲学之发展,也不要因哲学对社会重要而拔苗助长。“以前大家讲到新学问的时候,我们所常遇见的,就是权威。某国某大学某教授是这样说的,所以就是这样。在这次年会中,这一类的权威主义已大大减少了。可见我们的学术界,已经上了独立自主之途,这是最可令人满意的”,“综合的看起来,中国的哲学界,是在很快的进步中的。若让其自然发展,将来一定能有很好的成绩”。<sup>[6]</sup>社会不应过多干涉学校和学术,同样,学校和教育部门也不能领导社会。冯友兰指出:“至于说领导社会,哲学家或者可以,但哲学会是不能领导的,尤其是像这一类的举国一致的哲学会,本来是只以讨论研究为宗旨的。会中对于各种问题,决不能有一致的意见,所以也决不能做何领导的工作”。<sup>[6]</sup>可见,在冯先生看来,学术机构的唯一宗旨就是学术研究。

冯先生还通过对大学性质的分析,认为大学主要是研究机关和教育机关,并不直接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批评了当时的政府有人把大学看成是教育行政部门之一科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就常理说,大学的性质是什么?梅贻琦说过,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大学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科。现在政府的人站在官场上,常常说大学是属

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实在不合理”。<sup>[1]</sup>大学之所以不同于政府机关,是生产社会化的细密分工所造成的。冯友兰还指出:“严格说,一个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现在世界的学问越进步,分工越精细,对于任何一种学问,只有研究那一种学问的人有发言权,别人实在说来不能对专门知识发言,因为他没有资格。每一部分的专家如何去研究?研究什么?他不能叫别人了解,也不必叫别人了解;他们研究的成绩好坏,只有他们的同行可以了解,可以批评,别人不能干涉。所以国家应该给他们研究的自由”。<sup>[1]</sup>应当指出,冯先生的主张中过多理想化内容。大学不受任何干涉是不实际的,但政府确实不应过多地干涉大学的教育和学术,让大学在教育 and 学术上有自主权。

2. 发表《教育与政治》一文,阐述教育与政治的不同特点

大学应在教育和学术上有自主权,这是由教育、学术的特殊目的和性质决定的。1944年,冯友兰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教育和政治的目的是不相同的,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应该是什么”;政治的目的是承认“人是什么就是什么。”目的不同,手段就不同。教育重在教化,政治主张强制。“恃人之为善,是就人的应该是什么着想,这是教育的希望。用人之不得为非,是就人的是什么着想,这是政治的实际。用教育的希望,去对付政治的实际,是一定不能成功的”。<sup>[5]</sup>反过来,用政治的强制性措施,取代教育和学术对人的感化作用,就会扼杀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同样一定不能成功。

3. 直接参与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维护学校的教育和学术独立

冯先生在清华执教期间,作为清华大学的秘书长、校务委员会成员、文学院院长和代理主席,曾积极参与维护和促进清华走向独立的工作。冯先生以清华教授会代表名义,持教授会文件赴南京陈述动用“清华基金”扩建校舍、齐置设备等意见。当时清华基金由教育部和美国人共同管理,南京政府在殖民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并不赞成清华教授会提出的请求。经过冯友兰等人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扩建了图书馆、阅览室等。冯友兰说:“经过这次胜利以后,教授会的威望大为增高,实权也大为增大。原来称‘教职员’,现改称‘教职

员了”。<sup>[7]</sup>

#### 4. 积极支持“教授治校”方针

所谓“教授治校”，即以教授为主体的治校方针。当时清华的管理权力由三级机构实行：即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三级治校。教授会是基础，校务会是核心，行使教育、行政等方面的治校权力。冯友兰说：“所谓教授治校，在清华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形式。在罗家伦到校以前，清华本来有‘评议会’，由行政当局和教授会的代表组成。学校的规章制度必须由评议会通过，重要措施必须由评议会审议，才能执行。”<sup>[7]</sup>冯友兰和罗家伦一起，积极维护教授治校方针，为清华迈向学术独立的道路，做出了贡献。此外，在清华执教期间，冯先生还倡导并促成清华学派的形成。张岱年先生认为清华学派有四个特点，其第四点就是：清华学派“肯定学术与政治的区别，保持谦虚开放的思想态度”。<sup>[8]</sup>

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时期，冯先生作为文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继续为维持学术独立做自己的贡献，一直到三校重返北平。“在风雨飘摇、惊涛骇浪的环境中，联大保存了原来三校的教学班子，维持了‘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三校北返。”<sup>[1]</sup>冯先生还把西南联大“学术第一”、“兼容并包”的精神永远地铭刻在联大的纪念碑上。

###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教育和学术独立精神进行冷静反思

必须强调的是，只有把教育和学术独立思想放在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才能肯定其积极性和进步意义。教育和学术独立是在相对于“为官而学术”和殖民主义教育而立论时，其进步意义才是确定的。五四时期，确实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抽象地主张学术远离社会，把教育和学术看成象牙塔里孤立的的活动，这种学术活动当然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冯友兰用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学术实践，说明了“教育和学术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

#### 1. 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作出新的解释

冯先生曾明确指出，由蔡元培、陈独秀等所主张的“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以及后来出现的“纯技术的观点”，相对于五四以前的“为官而学术”来说，具有反传统的革命性，因而是进步的。其进步

性表现在，“为学术而学术”观点认为，学术的价值就在学术自身。而“纯技术的观点”虽属功利性主张，但比之于“为官而学术”，它毕竟主张人必须学习一门本领，以作为谋取职业的准备。

20世纪50年代以后，冯友兰虽然继续肯定“为学术而学术”的基本精神，但更强调学术研究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他说：“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知道，‘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在当时是针对什么而说的，它所针对的是‘为做官而学术’”。为学术而学术，“在当时的作用，是把学术、文艺从传统经学的‘乌烟瘴气’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所谓‘独立’者，是对于这些束缚说的。但是若把‘独立’抽象地孤立地看，则又是一种错误”。“不过五四前后，很多的人是把‘学术独立’的‘独立’，抽象地孤立地看。在现在看，他们是错的，但在当时，他们的看法，却有反传统的革命性。”<sup>[1]</sup>所以，离开了反传统的意义，“为学术而学术”的进步性就大大减小了。

冯友兰进而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可以重新发挥它的进步作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克服过去那种重理论而轻技术的观念。他说：“纯粹科学是属于理论方面的。科学的运用及技术是属于实践方面的。从近代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看，理论与技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sup>[1]</sup>理论一旦完全脱离实践，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

2. 强调学术可以为人民服务，但研究学术又不可有致用之心

学术可以为人民服务，是就学术的客观结果说；研究学术不可有致用之心，是就学术的研究动机说。如果学术研究以致用为目的，则可能有损于学术的价值。因为，并非任何学术的价值都能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衡量，学术的价值常常就在学术之自身。

冯友兰指出，只要将学术“为人民服务”理解为教育和学术前进的大方向，则“为学术而学术”与学术为人民服务并不矛盾，他说：“后来我了解，‘为人民服务’并不等于狭隘的实用主义”。“‘为学术而学术’是无所为而为的，以‘为人民服务’而学习研究，也可以说是有所为而为，但是这个有所为而为，从私的观点看，也是无所为而为。以‘为人民服务’而学习研究，对于社会说有所为而为，对于个人说是无所为而为”，“我们很难想象有什

么学术,可以是学术,而不能有益于人民。<sup>[1]</sup>

冯友兰关于学术为人民服务的理论理路是,学术的结果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但学术研究又不能先存致用之心。因为,学术研究如果先存致用之心,则往往会违背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其结果恰恰达不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学术是有用的,但是研究学术的时候,不可以有致用之心。为致用而学术,容易犯一种短视急躁病。结果学术研究不好,因而也无从致用。‘为学术而学术’,不以致用为意,反而可以得到学术的大用。这一点意思倒是可以批判地接受”。<sup>[1]</sup>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地研究学术活动自身的规律,人为地为学术研究订立过多的致用目的,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反而限制学术的发展。

### 3. 主张理论与实践并重

正因为冯先生一方面主张学术与为人民服务相统一,另一方面又强调学术自身的独立性。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1958年6月,冯先生发表了《树立一个对立面》一文,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什么是哲学、哲学系应不应该办等思想上的混乱,提出由于社会的分工,需要各种不同的人才,虽然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既懂理论,又能理论联系实际,但应有人多搞或专搞理论,有人多搞或专搞实际工作,大学或研究机构就是培

养多搞或专搞理论的人。专搞或多搞理论就是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文献资料,分析概念和范畴等等。冯友兰说:“我认为,从学术界方面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保证有一些人,在不求名、不求利而能生活的条件下,‘为学术而学术’。大学就是这样一种机构。它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sup>[7]</sup>冯友兰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教育和学术独立精神应当继续发扬,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大学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和学术独立,充分发挥教育和学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责任编辑:林建曾]

### 参考文献:

- [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2]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 [3]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4]传统与创新,第四届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M].
- [6]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1卷.[M].
- [7]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M].
- [8]张岱年.回忆清华大学哲学.直道而行.[M].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

(上接第151页)钱五百万赎故宰相吕端府第,赐其子藩。<sup>[3]</sup>(见《长编》卷73)此系真宗念其护持定策之功,出自特恩,不可援以为例。

又《长编》卷231载,神宗熙宁五年三月,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为市易本钱。此盖因王安石变法,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打击富商大贾操纵物价的不法行为,故而采取这种措施。由于触犯一些保守派官僚的利益,被指责为“与民争利”,行于一时,不久即废。<sup>[3]</sup>而据《宋会要辑稿》之《食货五一》内藏库条载,其实早在仁宗至和元年八月,有人看到河北入中军粮抄因久不兑支而贬值,建议朝廷出内藏库钱二百万缗乘机收购牟利,即遭到谏官的反对,以为内藏库、榷货务同是国家之物,“岂有榷货务固欲滞商人算抄而令内藏库乘时以市之,与民争利,伤体坏法,莫此为甚”,故罢之。<sup>[4]</sup>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宋代的内藏库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财政机构。我们当然不能相信它所有的财物都用在所谓“军旅饥馑”等军国大事方面,这里边肯定有相当一部分被皇帝及后宫挥霍。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国家财政长期吃紧、而各种开支又日益庞大的情况下,内藏库如同一座不时蓄泄的水库一样,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有益的调节作用。

[责任编辑:明秀丽]

### 参考文献:

- [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章如愚.群书考索[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5]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